

论魏晋南北朝地理博物小说 的多元文化形态

徐胜男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地理博物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具有博物学、史学、宗教等多元文化形态,是小说形式与博物学的内核、史乘的手法、宗教的外衣的有机结合,这种多元文化形态是独特时代的产物,对后世文学启发之功甚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地理博物小说;博物学;史学;宗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91-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2.015

On the Multi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iction of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U Sheng-nan

(College of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iction, as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has some scientific,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features. It has the essence of science, the writing techniques of history books and the guise of religion. The multicultural features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iction, as a product of the unique era, greatly influence the literary work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fiction; natural history; history; religion

地理博物小说是专记山川地理、动植物产、远国异民、神话传说、珍宝奇物等内容的一类志怪小说,以《山海经》为始,至魏晋南北朝达到高峰。魏晋南北朝地理博物志怪小说大致有:晋张华《博物志》、晋郭璞《玄中记》、无名氏《外国图》、梁任昉《述异记》、后秦王嘉《拾遗记》、南朝江淹《赤县经》、南朝顾野王《续洞冥记》等。其

中“《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则是‘博物’体志怪高峰期的作品,而以《博物志》成就较高”^[1]。目前学术界对地理博物小说的研究,多包含在对唐前志怪或六朝小说的研究范围内,如李剑国、侯忠义、王枝忠、陈文新等学者都在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研究中有所论及。对地理博物小说的专门研究则多从文献学、文学、文化

作者简介:徐胜男(1989—),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等角度出发^①。文学角度是研究地理博物小说的主要方面,但也应注意到它多元文化形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小说是先秦以来的博物知识浸润多元思想并逐渐方术化、志怪化的产物,博物学、史学、宗教等文化形态都包涵其中,这种多元文化形态,也反映出魏晋六朝时期思想与文化的某些侧面。

一、博物学特点

中国传统博物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科学研究系统,包括对大自然宏观的观察、描述与分类,以及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它类似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涵盖了今天的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矿产、生物、社会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包括了中国古代涉及人与自然交往的一切学问。因此很多时候,它是作为古人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在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探究自然的手段,博物学主要发挥认识自然的经世致用作用,这决定了博物学对知识的重视,也使知识成为地理博物小说的一个内在倾向。春秋至魏晋,对世界接触的不断加深促进了博物学的蓬勃发展,而且秦汉以来,巫文化的退潮使博物学预卜凶吉的政治历史作用减退,更专注于草木鸟兽虫鱼等知识,知识化倾向明显。这种背景之下,地理博物小说认识世界的作用被充分肯定,即使是以疾虚妄为宗旨的王充对《山海经》也语多肯定:“《山海》之造,见博物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能立二事之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2]这种认识价值也使经史注

解常援引《山海经》《博物志》等小说来说明事物。博物学孕育了地理博物小说,甚至《博物志》等小说也同时是博物学著作,因此除了知识化倾向的一致,博物学的特点还体现在地理博物小说的内容、结构、风格等方方面面。

地理博物小说内容博杂。《博物志》便因“杂错漫羨,而所无指归”^{[3]1010}的内容,被《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归入子部杂家类。范宁也指出《博物志》的内容“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虫鱼以及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故事的记录,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神话的材料”^{[4]2}。具体内容上,今本《博物志》十卷,前三卷记载地理动植;卷四五记载方术家言;卷六为杂考,包括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名物考等;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卷十杂说,包涵了神话传说、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玄中记》的内容也涵括了神话人物、异人异物、精怪变化、民间传说、异国物产等诸多方面。地理博物小说内容全面博杂俨然百科全书,是博物学宏大博物情怀的直接体现。

地理博物小说以地理方位为框架,以方位转移为依托的结构也有博物学的影子。地理学与博物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山水地理是博物学的重要内容,从大禹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到《禹贡》《周书·职方志》以及后来的《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河图括地象》《洛书》《遁甲开山图》《括地图》等地理专著,都是博物学的材料来源。因此地理博物小说多详于地理,在目录学上也多被归入地理类,如

^① 研究论文如李剑国《地理博物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南开学报》1984年第5期;罗欣《〈博物志〉成因三论》,《求索》2007年第9期,以及《先唐博物杂记类小说叙事空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王媛《〈博物志〉文献问题及其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阳清《〈玄中记〉辑本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6期;王晶波《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等。还有对地理博物小说做专门研究的硕士论文,除了对《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等单篇小说的研究外,以地理博物小说名题的有辽宁大学2006年古代文学专业韩晋的硕士论文《唐前地理博物志怪小说审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古代文学专业樊伟俊的硕士论文《魏晋南北朝博物类志怪小说研究》等。

《山海经》自《隋志》始长期被列入史部地理类,《玄中记》也被《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归入地理类。山川地理不仅是早期地理博物小说的主体,同时也是它的结构框架。《山海经》以“东西南北”的空间方位为线索,奠定了地理博物小说空间结构基础,其后地理博物小说也多遵循空间顺序,两汉时期的《神异经》结构上承袭了《山海经》,《十洲记》中十洲三岛的空间结构也十分明显。至魏晋六朝,空间意识已淡化,内容描述成为小说的主体,但空间框架隐形存在,我们仍然能从博杂的草木鸟兽虫鱼知识中感受到强烈的空间感和地理定位意识,如《博物志》卷三“异鱼”条载:

南海有鳄鱼,状似鼉,斩其头而乾之,去齿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东海有牛体鱼,其形状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潮去则毛伏。

东海蛟错鱼,生子,子惊还入母肠,寻复出^{[4]38}。

虽然此处的地理方位仅是一个模糊概念,而且内容的重点是讲述奇异物产,但对地理方位的界定仍是小说叙述的起点。又如《玄中记》对东南、东方、南方、北方等方位的称名,以及诸如“东方有柴都焉”“南方有炎火山焉”“北方有钟山焉”“东南有桃都山”“蓬莱之东,岱舆之山”^{[5]235-236}等记载,皆是以空间推移为框架结构的遗存。

此外,地理博物小说的志怪风格与博物学的志异色彩一致。“博物学是自然而然的学术、知识、技术和技能,是在有限的好奇心、欲望关照下的产物”^[6],即认识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是博物学发展的动力,凡是被科学化了的知识便失去了某种基于好奇与欲望基础上的吸引力,而逐渐成为专业领域内的专门科学,地理、气象、医学、数学等莫不如此。因此博物学宏大的博物框架主要是广泛吸收奇异内容和未科学化的知识构建起来的,这种志异倾向也使地理博物小说中有了奇珍异物、奇花异草、远国异民、奇风怪俗等内容。朱渊清在《魏晋博物学》一文中指出,魏晋博物学的主要特征为知识积累的认

识观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进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二是重视实用知识;三是有明显的志异倾向^[7]。这些特点无一不在地理博物小说中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来,可以说博物学是地理博物小说的母体。

魏晋以降,地理开发的完成,原始思维的消褪,人文宗教的发展,专门学科的建立等多方面原因使博物学渐趋衰落。博物学本身知识博杂的杂家风格也限制了它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学习知识的主导,博物化知识让位于仕途经济。博物小说也随着博物学的衰落,逐渐被其他各类小说所取代。

二、史学特点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发达,战国时私家勃兴,史乘逐渐分流,形成了“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8]事实。史学讲真实、重实录,儒家传统也贬斥怪力乱神,但正统史书中仍保留了大量关于阴阳灾异、佛道志怪、鬼神怪异的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史书对遥远历史的记载主要通过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实现;另一方面,时代的局限使宗教迷信思想支配着史书的写作,时人视鬼神怪异为实有,记载灾异便成为了史官的职责。因此史学与志怪小说有许多内容相通之处,志怪小说对怪诞灵异之事的实录与经史参行互补,故传统目录学视小说为正史之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将志怪小说归入史部。地理博物小说不仅有鬼神怪异的内容,还与史书《地理志》以及《五行志》联系紧密,因此目录学上,地理博物小说也常被归于史部,如《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归入史部地理类,《崇文总目》将《玄中记》归入史部地理类,《博物志》虽被《隋志》归入杂家类,但仍与史部有密切联系。因此,魏晋六朝地理博物小说从内容、手法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史学特点。

地理博物小说广采博引,不仅有从《周书》《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中直接取材者,还有许多内容与正史联系密切。如《博物志》卷一

及卷六“地理考”与正史中《地理志》关系密切,卷一“地理略”部分“水”条言:“漠北广远,中国人少有至北海者。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有北海明矣。”^{[4]10-11}与《汉书·霍去病传》中相关记载一致。卷六“典礼考”“文籍考”又与史书记载的典章制度、学术考论相印证。卷二、卷三奇异内容与史书及地志中《异物志》相接近,例如火浣布在《博物志》《玄中记》中都有记载,其中《玄中记》记载尤详: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山从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灭。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云气,而草木生叶枝条。至四月火然,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草木叶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过此山下,取柴以为薪,然之无尽之时;取其皮绩之,以为火浣布^{[5]235}。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注中述东汉梁冀曾得火浣布,《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作黄金涂、火浣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9],《三国志》注解中引《魏略·西戎传》亦曰:“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火浣布。”^{[10]861}又《三国志·三少帝纪第四》:“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10]117}注解中亦有《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神异经》等所记火浣布的内容,其中《异物志》曰:“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10]117}此《异物志》当为东汉杨孚所撰,《玄中记》成书晚于其后,继承了《异物志》的故事模式,且更加具体化,不仅对炎火山的地理位置、燃火的时间规律进行了具体描述,还奇思妙想以此作为火浣布的来历和奇异性的解释,清楚地展示出史学与小说的某种内在关联,不一定尽为真实却有补史之用。

小说可与正史互补的作用是因为小说家们秉承了史家实录态度,即使那些在今日看来荒诞怪异的内容,也是对当时人们认识观的如实

展现。郭璞不视闾诞迂夸的《山海经》为虚夸的态度颇能代表当时以异为真的认识观:“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及谈《山海经》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11]也印证了鲁迅所言:“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2]22}。此外,小说家们还保持了“书法不隐”的史官职业道德,不虚美不隐恶,如《博物志》虽多有仙方道术,但仍保持批判质疑的态度,其卷五有“辨方士”条中引文帝《典论》云:

议郎李覃学郝俭辟谷食茯苓,饮水中不寒,泄痢殆至殒命;军祭酒弘农董芬学甘始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寺人严峻就左慈学补导之术,阉竖真无事于斯,而逐声若此^{[4]65}。

文末又言:“司马迁云:无尧以天下让许由事。杨雄亦云:夸大者为之。杨雄又云:无仙道。桓谭亦同。”此处作者对于方术、仙道的批判虽只是转引他言,但作者的态度已隐含其中。出于与史书一脉相承的实录态度,小说家也多将自己的作品以补史自居,如郭宪称《汉武帝洞冥记》集“旧史所不载者”,葛洪视《西京杂记》与《汉书》性质等同,张华作《博物志》亦以补前代阙漏为目的:“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4]7}小说具有了史的态度以及客观化、真实化的史家叙事原则,便可当史料运用,发挥拾遗补阙的功能。

地理博物小说史学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博物学与史学渊源久远,博学广知是史官的基本素质:“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3]992}因此史书多从人文角度铺排山川、物产、民俗、礼制等内容,许多博学知识以史书为载体保存下来。其二,魏

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达,且汉代以后,私人著史风行。许多小说家也颇具史官才华,如张华、郭璞都是史官出身,其他小说家如任昉、葛洪、干宝等也具有史官身份。其三,长久以来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占主导,小说长期依附于史学发挥政治历史作用。至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评判小说仍不出“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的功利性政治伦常标准。总之,地理博物小说的史学特点,正印证了“小说家虽好集异闻,难于征信,然以纪载为职,则亦史之流也”^[13]。

三、宗教特点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2]22} 鲁迅此话是探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不刊之论,也指出了影响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宗教形态,即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相较而言,佛教因素在地理博物小说则出现甚少,一则因为博物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佛教大盛时,博物小说已式微;二则以宣扬佛法灵异为主要内容的“释氏辅教之书”大量存在,并不需要地理博物小说锦上添花。因此,魏晋六朝地理博物小说中的宗教形态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和早期道教,而且多是以一种潜在的思维方式存在。其中原始宗教如原始信仰、阴阳五行、神怪变化等准宗教内容,早期道教则如神仙思想、长生信仰等。

魏晋六朝时期人文宗教开始形成,原始宗教的形态已逐渐消失,但原始宗教思维却以一种隐性思维的形式留存下来,广泛存在于地理博物小说中,如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精怪变化故事,《玄中记》载有“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5]237} 以及其他山精、水狐等妖怪变化的故事,任昉《述异记》中也有“牛化为虎,羊化为狼”等记载。甚至一些非生物也可幻化为生物,如“玉精为白虎。金精为车马。铜精为僮佣。铅精为老妇。”^{[5]240} 精怪变化又以精怪化人的故事最为典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狐狸精”的故事: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5]239}。

人化为狐的故事母题在后世文学中大放异彩,此类精怪变化的内容也构成了后世志怪以及神魔小说故事的主体。在这里万物有灵思想已褪去了巫术与蛮荒气息,不再发挥解释自然的现实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故事本身的荒诞奇异的审美感受。又如随处可见的巫术思想,《博物志》所载异物许多都有巫术的影子,如描写“见”到某物产生的后果,“见则天下大旱”“相视则孕”“望月而孕”“妇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等,皆是以巫术原理为基础。巫术在《山海经》中主要发挥治疗疾病和征兆自然灾害的现实作用,至《博物志》则更多具有了神秘主义色彩。《博物志》卷十又载:“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阳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4]109} 孕妇穿上丈夫衣服,并执行一系列动作后可生男孩,这个故事中巫术的现实作用依稀尚存。但整体上,在地理博物小说中的原始宗教思想,实用性减弱向着志异猎奇的方向发展。

地理博物小说的道教特点主要体现为神仙思想以及长生信仰。神仙思想源于先秦,多描绘仙人、仙药、仙境,宣扬长生不老的两汉小说已不乏对仙人仙境与神异物产的描绘,如《汉武帝故事》的神仙家色彩,《神异经》《洞冥记》中的神山仙境、奇珍异物。《博物志》卷一“物产”也有不死草、石脂、玉膏、英泉、不死树等。神仙人物也时常出现,如《博物志》卷八有汉武帝会西王母之事,又载:“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4]93} 卷九:“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4]104} 《玄中记》中也频频出现西王母、黄帝轩辕、昆仑、蓬莱、东海等字眼,神仙家色彩鲜明。其实《列仙传》《神仙传》等神仙传记才是神仙思想介入文学的主要途径,地理博物小说只是展现了神仙思想风行的一个社会侧面。相较

而言,以“寿”为手段展现长生信仰的内容则更能体现道教特色,如《博物志》中有轩辕国、白民国、骊兜国等长寿之国,《玄中记》中有千岁树精、万岁树精、百岁鼠、百岁伏翼、千岁鹤、千岁燕、千岁鼈、千岁龟、千岁蟾蜍等带有“寿”属性的动植物。因为长寿它们还获得了某种特异功能,如“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百岁之鼠化为蝙蝠”,甚至可化为神,如“百岁鼠化为神”。闻一多《神仙考》曰:“以‘寿’为目的,以‘敬’为手段,是古代人生观的最大特色。”^[14]人们因“寿”而“敬”,对带有“寿”属性的自然生物颇怀敬意,并寄希望于从它们身上获得这种长寿,因此有了“百岁伏翼,其色赤,止则倒县;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千岁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5]239}等记载。而且此处所记长寿之法多为食用,也是对服食长生的早期道教信仰的反映。另外,小说中的复活故事与长生信仰也有一定关联,虽然复活故事在后世志怪小说中不断获得丰富内涵,不是长生信仰能简单解释的,但单就“复活”而言,与巫覡、方士、道士所秉承的“不死”信仰一脉相承,表达的仍是对“长生”的向往。

其实,魏晋六朝地理博物小说“积累了战国秦汉以来的全部地理博物及术数方伎知识,融地理博物学、巫术、方士、神仙学、阴阳五行学、讖纬学以及星命卜筮等五花八门的术数于一炉……”^[15]它所包含的准宗教思想形态复杂多元,并非原始宗教和道教所能全部涵盖。如方技术数的流行使社会方术化气息浓重,知识分子也被方士化,“两汉以迄六朝,所称博洽之士,于术数、方技靡不淹通,如东方、中垒、平子、景纯、崔敏、崔浩、刘焯、刘炫之属,凡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皆穷极奥眇,彼以为学问中一事也”^[16]。因此小说中图讖方技等方术知识目不暇览,它们有原始巫术的影子,同时也是道教术数的源头,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具备着准宗教的形态与影响。

综上所述,地理博物小说是博物学的内核、史乘的手法、宗教的外衣与小说形式的有机结

合。小说观念不自觉的魏晋六朝时期,地理博物小说的多元文化形态反映着复杂多端的社会现实,不以今天的文学观来批评其不足,更多关注它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及文化因素,对我们认识古代社会、解读古代小说都有启迪之效。

参考文献:

- [1] 陈文新.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01.
- [2]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598 - 599.
- [3]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4] 范宁. 博物志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鲁迅. 古小说钩沉[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6] 刘华杰. 博物学论纲[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2 - 11.
- [7] 朱渊清. 魏晋博物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5): 43 - 51.
- [8] 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1.
- [9]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19.
- [10]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1] 山海经[M]. 郭璞, 注, 毕沅,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 - 4.
- [1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3]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57.
- [14] 闻一多. 神话与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53.
- [15] 李剑国. 地理博物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J]. 南开学报, 1984(5): 8 - 17.
- [16]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394.

(责任编辑: 李秀荣)